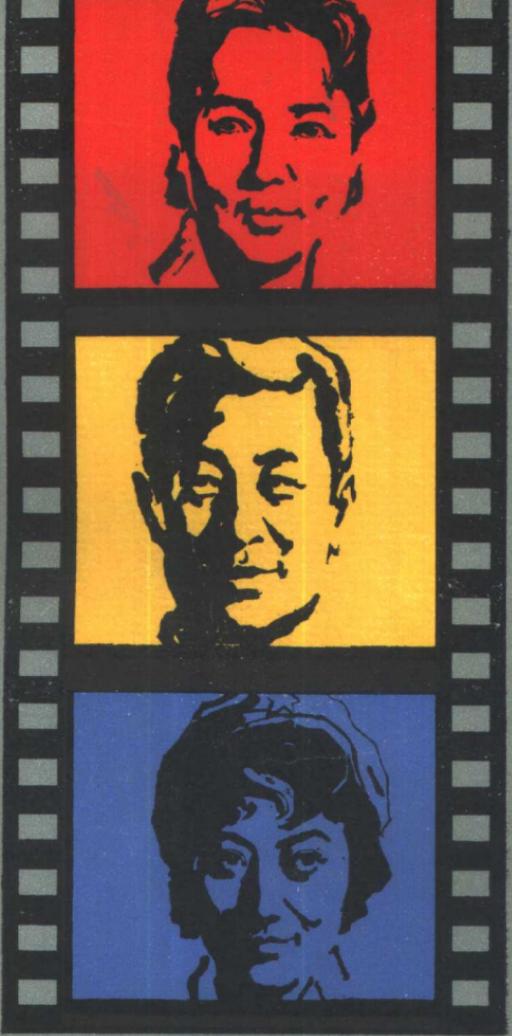


影



第五辑

春秋事



影 事 春 秋

(第五辑)

宋 绍 明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影事春秋

(第五辑)

宋绍明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133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100

书号 10099·1588 定价 0.46 元

目 录

更有黄花晚节香

——记电影导演王苹 (1)

丰功盛誉见匠心

——记电影导演李俊 (14)

似一团燃烧的火

——记电影导演严寄洲 (27)

漫长的追求

——记电影导演华纯 (37)

硝烟长相忆

——记电影导演李舒田 (46)

从“女秀才”到女导演

——记电影导演王少岩 (53)

秋来霜染叶更红

——记电影演员田华 (65)

根深叶茂绿正浓

——访电影演员高保成 (80)

可贵的军人气质

——记电影演员王心刚 (89)

在百花园中芬芳吐艳

——记电影演员王晓棠 (98)

党把他抱大的	
——记电影演员张勇手	•(111)
朴实 自然 深刻	
——访电影演员刘江	•(119)
霜染两鬓露华浓	
——访电影演员李炎	•(127)
她从炮火中走来	
——记电影演员曲云	•(136)
不被人忘却的艺术形象	
——记电影演员里坡	•(147)
曲径幽谷兰放香	
——记电影演员袁霞	•(155)
春风春雨染花红	
——记电影演员陶玉玲	•(165)
在美的探索中	
——记电影演员杨雅琴	•(175)
一株沙枣花	
——记电影演员斯琴高娃	•(182)
大海的儿子	
——记青年电影演员唐国强	•(189)
新芽破土闹春来	
——记青年电影演员陈佩斯	•(197)
愿做一滴清泉水	
——记青年电影演员宝珣	•(205)
后记	•(213)

更有黄花晚节香

——记电影导演王莘



王 莘

她每日背着军用挎包上班、下班，孜孜不倦，日夜操劳……

她，就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王莘。

五十年代，王莘同志导演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永不消逝的电波》、《江山多娇》和《柳堡的故事》等影片，以深刻、细腻和充满激情，奠定了她艺术风格的基础。六十

她，以朴素、自然、细腻和抒情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千千万万人的尊敬，有行家，也有普通劳动群众。她，创造出一个个感人肺腑的艺术形象，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鼓舞人们奋发向前。她，在江青一伙迫害面前，立场坚定，毫不屈服，永做生活的强者。她，已满头银发，年近六十六岁高龄，没有在艺术的沃土上停止耕耘，艺术的生命力，召唤

年代前几年，又连续导演了《勐腊沙》、《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参加了音乐舞蹈史诗影片《东方红》的导演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她曾做《闪闪的红星》顾问，并导演了《红军不怕远征难》和《我们是八路军》，使人们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受到亿万观众的热烈称赞。

展开理想的翅膀

王苹原名王光珍，一九一六年农历八月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回族知识分子家庭。哥哥、姐姐都是教员，这样的教育世家，使她有一个十分优越的学习条件。她在南京女子中学读书时，兢兢业业地刻苦学习，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男女同校的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高中师范。在黑暗的旧中国，浓厚的封建思想为她的前进脚步设下重重羁绊，父亲不同意她去男女同校的学校读书。为了求得一些新知识、新思想，她得到了哥哥、姐姐们的支持，说服了父亲，达到了上学的目的。

王苹自幼喜欢唱歌、跳舞、美术，更酷爱文学。她在课外阅读了许多进步的书籍，诸如高尔基的《母亲》、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蚀》等。这些书打开了她思想的天窗，使她追求自由、民主和解放。一九三三年，学校里成立了一个业余剧团，她偷偷地瞒着家里，参加了话剧演出，在独幕剧《姐姐》、《女儿神》中，都曾扮演过主角。同时，还参加了一些其它文体活动。

一九三四年夏天，王苹以优异的成绩高师毕业了，学校保送她到南京市兴中门小学校教书。她认为自己能独立工作了，自由了，可以不受家庭的约束了。于是，她边教书，边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了业余话剧团体——磨风剧社。这个剧社是南京一些文艺爱好者集合在一起组织的。他们准备排演易卜生的多幕话剧《玩偶之家》，但是没有导演。上海剧联派了章泯同志专程到南京为他们做导演，并派周颖同志前来帮助他们剧社工作。

一九三五年元旦，《玩偶之家》在南京正式公演。王苹饰女主人公娜拉。一共演了三天，给金陵的寒冬带来了暖流。这个戏是写娜拉与其丈夫海尔茂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男权思想与妇女独立思想的对立。剧本所揭示的思想，象和煦的春风拂进人们的心田。观众将戏比己，看社会，心灵受到撞击，受到教益，得到启迪。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观看。然而，饰演娜拉的王苹却因此而招来一场弥天大祸。父亲斥责她伤风败俗，不准再出家门；校长诬蔑她破坏校规，把她赶出了校门。国民党政府更认为这是犯上作乱，不但逮捕了剧社的几名成员，还以南京市教育局的名义发出通令：“一个戏子岂能为人之师”，她被革了职。教育局并通令南京市各学校，不准再聘她担任教师。她失业了，生活无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京各界人士的无比义愤。在党的领导下，一个规模宏大的请愿活动震动了整个金陵。剧联的同志们为她呼吁，为她抗议……

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王苹来到江苏省江宁县铜山

镇的一所小学校教书。这是一个风光秀丽、景色怡人的地方。她来到这个崭新的天地感到心情舒畅。乡村那淳朴、天真的孩子，给她欣慰和希望。同时，她能接触那些勤劳朴实的农民，了解到他们生活的苦难。逐步认识了社会和人生，懂得了爱和恨。磨风剧社的朋友们时刻关心王苹的进步与成长，常常到江宁来给她讲述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左翼戏剧运动的情况。使她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增强了投身革命的信心和勇气。一天，张水华、王逸又来了，兴奋地告诉她，党决定在山西开展戏剧运动，准备推荐她去参加。她欣然答应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王苹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绕道北平，到山西太原去参加戏剧运动了。她展开了理想的翅膀，向着光明和自由，飞翔，飞翔……

漫漫长夜

王苹随宋之的一起到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公司，和田方同志合作参加电影《无限生涯》的拍摄工作，同时参加剧联领导的西北剧社的话剧《谁的罪》演出。

《无限生涯》是宋之的写的一部反映煤矿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影片。当时，闫锡山本想找一些人拍电影，借以捞取政治资本，得知剧本的内容后，便百般破坏，采取不发工资，从生活上卡他们，并派便衣特务监视他们的活动。

受生活所迫，王苹在太原无法呆下去了。在剧联的协助下，她随丈夫宋之的又到了上海。两个人都没有工作，生活

十分贫困，只凭宋之的写点影评维持，每天能吃两个烧饼就心满意足了。当时，王苹唯一的财产，是她妈妈送给她的一枚戒指。生活过不去了，便将戒指当到当铺里，每次只当五元，老板劝她多当几个钱，她不敢，担心原物收不回来。她怀孕已经八个月了，为了减轻家庭生活负担，还要束着肚子去拍电影。每天，顶着晨星走出家门；晚上，披着夜雾返回家里。他们的物质生活是艰难的，但精神生活是充实的，俩人经常一起谈事业，谈理想，谈生活，谈信仰，相处得非常融洽。

难忘的教诲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苹参加了抗日救亡演剧一队，到南京、济南、开封、武汉等地，宣传抗日，反对投降。后来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随宋之的辗转于重庆、香港、上海之间，参加戏剧运动，和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在一起，运用舞台和银幕，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她先后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重庆业余剧人协会和影人剧团，以及中国艺术剧社、香港旅港剧人协会，参加演出过宋之的《雾重庆》，曹禺的《家》和《北京人》，还参加了《大雷雨》、《钦差大臣》、《罗密欧与朱丽叶》、《民族英雄》、《武则天》等许多剧目的演出。

聚集在重庆的文艺工作者，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重新组织了中国艺术剧社。当时这个剧社的负责人是司徒慧敏、金

山、于伶等同志。他们演出了夏衍、于伶、宋之的等同志的剧作。王苹同志参加了一些剧目的演出。周总理尽管每日工作很忙，要出席党内外的会议，要同广大群众接触，要同爱国人士、新闻界及其它各方面的人士接谈，还要亲自进行外事活动，但他不仅亲临观看演出，还亲自审阅剧本。有时来得早了，就去后台。总理喜欢《雾重庆》，有些台词他都背得下来，甚至演员说错了台词，总理也能指出。从那时开始，在总理的教育下，王苹开始懂得了什么是革命文艺，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周总理在重庆工作期间，经常引用鲁迅的两句诗来教育他们：“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皖南事变后，在重庆的文艺工作者，一部分赴延安，一部分去香港。王苹原打算去延安的，并在八路军办事处登记了名字。周总理说服宋之的：你们要在一起，一方面可以掩护，另外还可以演戏。这样，王苹同志把自己的证件让给了别人，她随宋之的到香港去了。

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回到上海。宋之的应陈毅同志的邀请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接着又调往东北第四野战军工作。王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女儿留在上海，她一边参加剧社的演出活动，一边在昆仑影业公司参加一些进步影片的拍摄。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丽人行》、《天堂春梦》、《关不住的春光》、《新闻怨》中，她都扮演过一些角色。

一九四八年底，党获悉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对进步文艺工

作者进行迫害，决定将一批同志转移出上海。王苹同志被批准到华北解放区。她几经辗转来到石家庄解放区，住在干部招待所里。一天，服务员请她接电话：“王苹同志，你好吗？怎么样，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原来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她听着这亲切熟悉的声音，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很好……谢谢您。”“是不是要找一找宋之的同志啊？”周恩来同志关切地问。“不，我是来工作的，不是为找他的。”周恩来同志理解地笑了，答应给她安排工作。不久，她被分配到华北大学三部研究室。

周总理对王苹同志的关怀和教诲，她永志不忘，成为她巨大的精神力量，使她在艺术攀登的坎坷中，不畏艰难险阻，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导演的启蒙课

王苹同志说：“我对部队是有感情的，我的事业，真正的艺术生活，还是从部队开始的。过去演话剧，也演过主角，并没做出什么大的成绩。虽然当过电影演员，但对电影导演是一窍不通的。没上过电影学院，不是什么科班出身，当电影导演，完全是工作需要，是党的教育，部队培养的结果。”

一九四九年，王苹被分配到东北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一九五〇年，又调到军委总政文化部电影处工作。

她的导演生活，是从这儿开始的。

一九五一年的一天，电影处接到总政文化部的一个通知：

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同志指示，该校要组织一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演习，要求把它拍成一部军事教学片，作为我军的一个教材。任务落在王苹同志身上。这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人多，场面大，动作快。它不能象故事片那样，可以事先在摄影棚内进行反复排练，事后又不允许补拍和重拍。怎么办？领导上及时对她进行了教育和鼓励，使她认识到这项工作是我军现代化的需要。没有干过要学着干，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王苹同志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初春的一天，她带着总政治部的介绍信来到南京军事学院。人们见她是个女同志，都向她投来怀疑的目光，但刘伯承同志亲自接见她。开始，她侷促极了，因为刘伯承同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一会工夫，就象谈家常似地谈工作了。王苹说：“我什么也不懂，既不懂军事，也不懂电影。”刘伯承同志哈哈大笑着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不要紧，只要你有胆子拍，我们就支持你！”并马上派郭化若和陶汉章两位同志给她当军事顾问，从各军兵种调人来给她讲有关的军事知识。每天八个小时的学习，顾问总是跟着她，解说员总是陪着她。并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大力协助下，委派著名摄影师苏清河同志率领了北影和新影两个厂的摄影队参加了拍摄工作。这次演习是在某地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进行的，面对这样一个广阔的战场，就要求王苹同志也要象这次战斗的指挥员那样，熟悉和掌握演习的全局，以便对这支庞大的摄影队伍提出各种各样的拍摄要求来。演习开始后，她和摄影师

一道，奔来跑去地抢镜头。她朝气蓬勃和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受到各级指战员的称赞。这个《河川进攻》影片是建国以后拍的第一部大型军事教学片，至今仍是宝贵的资料。

初次导演的实践，丰富了王苹的导演知识，她说：“这部片子是我业务上的启蒙课，奠定了我从事导演工作的第一块基石，激发我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决心。”

接着，一九五三年，她又导演了另一部教学片《速成识字法》。

一九五四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建成了。王苹被调来正式担任导演工作。她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该厂的第一部故事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由于第一次拍故事片，缺乏经验，一下子拍了四万米胶片，长达三、四个小时。怎么办？她虚心向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等老辈电影艺术家求教，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她去芜存菁，完成了影片的摄制工作。至今提起往事，她还十分激动，感激党的关怀和培养。

提起党的关怀和培养，王苹同志以无比崇敬的心情，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后来对她的教诲。

周总理在政治上对王苹同志进行长期的、耐心的教育，在工作上又不断提出要求，鼓励她继续前进。一九六二年，她导演的《槐树庄》，获得了《大众电影》举办的第二届“百花奖”中的“最佳导演奖”。周总理亲临发奖大会，会后，总理把导演《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任务亲自交给了王苹同志。当时这出话剧已在各地上演，王苹同志怕担负不起来，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总理亲切地对她说：“你不要妄自菲薄，只要

肯下功夫，一定可以搞好的！”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下，王莘同志勇敢地挑起了重担，将《霓虹灯下的哨兵》拍成了影片。

一九六四年，周总理亲自倡议并自始至终领导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拍摄。王莘同志是该片的导演之一。周总理曾指示说，《东方红》是一部革命史诗，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而这样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会堂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因此一定要在介绍这部史诗的同时，把人民大会堂也介绍给观众。根据这个指示，王莘同志组织拍摄了一组有广场、天安门、国徽特写、大会堂全景和内景，以及包括各界群众及老人孩子等等万人涌入的镜头。这组镜头赋予影片以更深的寓意，这样就能更好地表现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宣告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充分显示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宏伟磅礴的气势，预示着我们还将取得更大的胜利。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同时，还关心着一部电影的镜头设计，竟连这样细微的事情都想到了。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总理的这类指示有许许多多。王莘同志说，《东方红》拍成受观众欢迎的影片，里面渗透着总理的心血。

不知疲倦地劳动

王莘同志从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来拍摄第一部故事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部影片《东

方红》，其间，一部刚刚拍完，紧接着拍下一部。她没有请过一天假，有时病了，仍然坚持工作。她说，搞艺术，不全身心是搞不出东西来的。她认为工作就是最大的快慰。宋之的同志突然病逝之后，王苹让三个大孩子都去住校，把最小的孩子寄托给保姆，她整天钻到工作中。在摄影棚，在洗印间，在剪辑台上，人们常常看到她奔忙的身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仿佛不知劳累和疲倦。

一九五八年，《永不消逝的电波》拍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了。她突然患了半身瘫痪病。制片主任从上海打来电话，问她时间怎样安排。王苹同志没有让摄制组同志等她，她强力支撑着赶到了拍摄现场，摄制组同志见她带着重病来到第一线，都十分感动。许多同志淌下了热泪。王苹同志忘我的工作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组的革命热情，人人默默地以她为榜样，没有私心，没有杂念，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我们是八路军》分镜头剧本，就是她在病中，扒在床头写出来的。那年，她已六十二岁了，依然同摄制组一起到陕北拍摄外景。

王苹同志的创作态度极为严肃认真。在拍摄《柳堡的故事》中，她找到作者，从人物、场景、情节到每一个细节的处理，认真研究，反复推敲。为了让扮演二妹子的陶玉玲塑造好角色，她们同居一室，她把自己的导演构思，人物的思想和要求，一一向第一次走上银幕的陶玉玲述说，启发她进入角色并有所创造。为了选好外景，她跑了江南许多城乡。在拍摄中，她调动各种艺术手段，着力刻划出李进和二妹子



《柳堡的故事》剧照

质朴、纯真的爱情，充分选用江南水乡特有的大风车、小桥、流水等景色，再配上富于江南情调的抒情插曲，创造出一种明快、清丽的艺术境界，使人物和环境、情与景融为一体，整个影片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抒情意味。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王苹逐渐形成了朴实、细腻、优美、抒情的艺术风格。在艺术界和广大观众中享有很高的赞誉，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尊敬。但她谦虚谨慎，尊重别人，善于同剧作者合作，她说：“一个导演的生活面是有限的，好的导演应当善于从剧作者身上学习其所长，同他们赤诚相处，密切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在银幕上塑造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凡是同她合作过的人，都称赞她这种良好的